

## 英國文學中的宗教面面觀

趙美玲／陳國榮

自西元 597 年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受命於羅馬教皇格列哥里（Gregory the Great）開始在肯特（Kent）傳授基督教後，盎格魯撒克遜人很快地全面接受基督文化的洗禮。在統治階層推波助瀾之下，基督教成為人們的中心信仰。自此，英國政治、社會與宗教的關係即密不可分。不論是個人虔誠的信仰、政治權力的角逐、甚或英國與歐陸霸權的鬥爭，宗教都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在此影響下，英國文學的產生、演變與進展自然與宗教不可分離。

貝奧武夫（*Beowulf*）是英國文學的第一部主要作品，約完成於西元八世紀。其內容描述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祖先在丹麥及瑞典南方的英勇事蹟。故事時間背景是在五世紀末，也就是英格蘭接受基督教文明的一百多年前。然而篤信基督教的詩人卻不斷地將其宗教信仰與理念加諸於這些異教徒角色所處的社會文化之中。由於不同的信仰並存於作品中，常常使得其情節內容不甚協調。如詩人把格倫德爾（Grendel）視為聖經故事中殺害弟弟亞伯（Abel）的該隱（Cain）之後裔。因此他被歸類為與上帝抗爭的各種妖魔鬼怪，一輩子受詛咒且流落在外，直到能再次得到上帝的恩典為止。原本單純為人類與自然的爭鬥，一旦被賦予宗教意義之後，很快地變成善惡之爭。另外，這種勇士社會（warrior society）所尊崇的英雄規範（heroic codes），強調的是以牙還牙、血債血還（blood vengeance）以及追求個人的榮耀。貝爾武夫為丹麥人復仇而殺死格倫德爾，格倫德爾的母親為其子復仇，而殺害了丹麥國王最親近的大臣。貝爾武夫又再次為丹麥國王復仇。此種冤冤相報的循環，在當時異教徒的世界中，一切顯得合理且自然。但是這卻與基督教義所秉持的以

德報怨觀念大相逕庭。再者，貝爾武夫在與火龍奮戰後死亡，其所強調的是個人的英名永留，以及帶給國人的財富。這與基督教義所頌揚的死後永生又顯得格格不入。因此在全詩中，異教徒的價值觀與基督詩人的宗教觀常常交錯並置，不時顯得突兀。然而這種現象正也顯示出，在英國文學濫觴之際，宗教即已強力介入並試圖改變文學作品的風貌。

亞瑟王傳奇（the Arthurian Legends）中《蓋文爵士與綠騎士》（*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的故事雖然著重騎俠風範與個人理想的追尋，但其中心思想仍深受基督教所闡述的真理及所強調的戒律影響。這種宗教理念具體表現在蓋文爵士的盾牌上。飾有五角星形的盾牌象徵友誼、慷慨、貞潔、禮節、與虔誠（friendship, generosity, chastity, courtesy, and piety）。他替亞瑟王接受綠騎士的相互砍頭之挑戰，歷經各種艱困旅程尋找綠騎士以信守承諾。最後他三度拒絕城堡夫人的誘惑而堅守其貞潔，但卻能溫文有禮地保持城堡夫人的顏面。這些都是蓋文爵士身為一騎士所具備的美德。而在城堡中的誘惑令人聯想到聖經中約瑟（Joseph）堅拒波提乏（Potiphar）妻子誘惑的故事。更有論者把城堡夫人贈與蓋文爵士的腰帶比喻成夏娃用以誘惑亞當的蘋果。全詩中不時地以聖經典故為歷史背景，並以各種宗教節令為蓋文爵士旅程的時間背景。其間，蓋文爵士時時刻刻遵循各種宗教禮儀。因此，雖然不少論者認為這個作品基本上是對卡米洛（Camelot）所代表的超脫俗世之騎俠制度的批判，然而經由蓋文爵士所表現畏懼死亡的弱點，反而能凸顯騎士社會及宗教理念加諸於騎士身上的高道德標準。其為七情六慾所困，顯現出人性的真實面，反而更能彰顯人性的可貴。更重要的是，基督教的義理經由統治階層及上流社會的支持與體現，得以更為廣泛的傳遞，達到上行下效、風吹草偃的功效。傳奇故事的普及，也同時推廣了基督教的宗教理念，而與騎士美德相輔相成。

喬叟（Geoffrey Chaucer）的《坎特伯利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是以前往坎特伯利大教堂朝聖的旅途中，各個階層的人物所說的故事為主幹。雖然內容大都不是宗教議題，然而藉由說故事者間的互動、作者對教會人士的負面描述、以及一些故事本身對教會的嘲諷，教會的權威也受到質疑與挑戰。作品中許多說故事者皆是教會相關人士。在中古世紀動盪不安的社會中，教會一直都是穩定社會的支柱，也享有崇高的政經地位。但到了中古世紀末期，教會內部開始顯現出一些腐敗與人謀不臧等等的弊病。如果將《坎特伯利故事集》視為當時社會的縮影，對於教會這個神聖的階層，喬叟除藉由較正派的神職人員如牧師和修女的描繪與故事來肯定它的價值外，也加入如赦罪修士、女修道院長、與女修道院教士等較負面的教會人員，來凸顯與嘲諷教會的腐敗。女修道院教士理應嚴守禁慾的戒律，但他所說的故事的主要內容卻是模仿典雅愛情（courtly love）的動物寓言。雖然故事的寓意是教人不要聽信諂媚，但故事本身卻充滿了世俗的內涵，如雄雞像唐璜般的坐擁妻妾、與愛妾間的情慾糾葛、夢的解析等。其嚴肅的寓意與輕佻情節間的矛盾，清楚的反映出說故事者的表裡不一。相較之下，赦罪修士的貪腐行徑則顯得高調、大膽多了。他能言善道，憑著三吋不爛之舌，誘騙錢財。他利用教會，以假的聖物、販賣假的贖罪券來滿足私慾。他利用三個貪財的年輕人自相殘殺的故事，來證明貪婪是一切罪惡的根源。但他本身卻是這種罪行的最佳代言人。喬叟從各個不同角度來窺探宗教，並在《坎特伯利故事集》中呈現了前所未有的宗教多元面貌。

\* \* \*

文藝復興時期的西方文明由原本以神為中心的思維轉變為以人為中心的思潮。然而宗教對文學創作不但絲毫不減其影響力，反而

因為信仰的衝突，讓文學作品更充滿張力以及更具有豐富的內涵。廷德爾（William Tyndale）與喀爾文（John Calvin）的宗教論述對往後的文學發展都有深遠的影響。亨利八世因為政治的因素而與羅馬教廷的決裂，進而創立了英國國教，使得英國獲得宗教的自主權，進而衍生與其他教派的衝突。影響後世深遠的英文聖經欽定版（King James Version）則在王室的支持下於 1611 年完成。

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的劇本或詩歌很少直接觸及宗教問題。然而在他的許多劇作中，都間接地探討宗教議題。如在《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中，基督教與猶太教衝突就透過角色的對立呈現。在劇中十四世紀的威尼斯，基督教為主流宗教，而且劇中的主要角色幾乎全為基督徒。身為猶太教徒的夏洛克（Shylock）與基督教徒之間存在著不可跨越的鴻溝。夏洛克的角​​色匯集了猶太人的負面特質，他吝嗇並利用放高利貸來獲得暴利的行徑，一直為較慷慨的、借錢不要求利息的安東尼奧（Antonio）所不齒。兩者的衝突在安東尼奧為好友向夏洛克借貸不需支付利息，但若違約必須償還一磅肉的契約之時達到高點。在安東尼奧違背契約後，夏洛克拒絕雙倍的償還金而堅持要取他的一磅肉。此事已將純粹的借貸關係提昇為個人恩怨，並激化長久存在於彼此間的宗教對立。最後，基督教徒大獲全勝。透過鮑西婭（Portia）的口才與詭辯，夏洛克由原告轉為被告，所有的財產皆被沒收。雖然之後夏洛克的一半財產將歸於他皈依基督教的女兒，另一半則可在​​他改信基督教後歸還於他，但夏洛克最終被迫放棄其猶太教信仰。這從基督教的觀點而言，可能是件值得稱道的事，因為他們成功地讓一個異教徒皈依為基督徒。然而此劇對被迫放棄自己宗教信仰的人所面對的痛苦與掙扎卻有意無意地漠視。對於夏洛克而言，接受基督教則是保全性命與財產的唯一途徑。由劇本的結局可看出，當時基督教的自我優越感與龐大的勢力排擠了其他宗教生存的空間。

鄧恩（John Donne）雖然身為英國國教的牧師，但在其宗教詩中，卻以寫實且情慾的手法，利用各種不尋常的譬喻來呈現個人的宗教情感。在〈Batter my heart, three person'd God〉一詩中，他把自己當成一個已被敵人佔領的城鎮，要求上帝以武力打擊、摧殘並焚燒他，以懲罰他的懦弱與不忠，讓他能有重生的機會。他又把自己比擬為被迫與敵人聯姻的少女，希望上帝能逼使她解除婚約，將她俘虜。因為藉此手段她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只有透過上帝侵犯她，她才能保有貞操。（Except you enthrall mee, never shall be free, / Nor ever chaste, except you ravish mee.）以男女關係手法來描述個人與上帝之間的關係雖然存在已久，然而以情慾概念來描述個人宗教信仰卻是種完全顛覆傳統宗教觀的手法。而在〈Death be not proud〉一詩中，詩人因為虔誠的宗教信仰，完全無懼於死亡的威脅。雖然死神可能強大且可怕，但也無法滅亡他。因為死亡所帶來的僅是短暫的休息與睡眠，接下來是更多的快樂在等待著他。如果死神所帶來的僅是短暫的睡眠，罌粟花或是魔咒同樣地也可以有此能力，因此死神有何值得驕傲之處？最後詩人提到，在片刻的睡眠之後，我們會在永恆之中醒來。死亡將不存在，因為死神最終必將死亡。（One short sleepe past, wee wake eternally, / And death shall be no more, death, thou shalt die.）鄧恩詩中所顯現的這兩種宗教觀，雖然不是創舉，然而他卻利用各種別出心裁的譬喻，以生活化的觀念來表達對上帝與死亡的看法。這種技巧把文學與宗教的關係帶到另一個新的境界。

米爾頓（John Milton）的《失樂園》（*Paradise Lost*）雖然以上帝與撒旦間的善惡之爭為主軸，但它卻以異於傳統基督教的論述來凸顯此衝突。《失樂園》的主題圍繞在聖經故事中人類的墮落。不同於以往一味的將人類的墮落歸咎於撒旦的野心，與強調人類對上帝的背叛，米爾頓分別以撒旦、人類、與上帝三種角度來重新詮釋此膾炙人口的聖經故事。雖然米爾頓在《失樂園》一開始即開宗明義

地指出，此詩最主要目的為肯定神意並為神對人類的態度辯護（assert Eternal Providence and justify the ways of God to men），但從詩中顛覆傳統對撒旦與上帝之描述，不難窺出米爾頓質疑當時教會權威的企圖。在《失樂園》中，撒旦不再是純然的邪惡象徵，而是具有七情六慾，甚至威嚴雄偉的角色。而上帝的神意，透過撒旦的論述與背叛，也不再是絕對不容質疑或挑戰。撒旦因忌妒彌賽亞而引領其它的天使叛變，被上帝擊敗後蟄居於地獄伺機復仇。他在地獄藉由雄辯的口才、破釜沉舟的決心、與領袖的氣質，統領對抗天庭的勢力。其丰采足以與其他史詩英雄分庭抗禮，甚至可與上帝匹敵。基本上這種對抗已經成為一種權力的爭奪。而上帝所創造的人類，雖然成為這場鬥爭下的棋子，但亞當與夏娃並非全然被動的接受擺布。亞當對自己生命的好奇、夏娃為蛇所魅惑、以及亞當選擇共同承擔夏娃的罪等等，皆顯示出人類具有自主意識，而非純粹是被操控的工具。藉由賦予人類好奇心與選擇權，米爾頓也強調，人類因墮落而被逐出伊甸園是自由意志的表現，而非純然是宿命。

\* \* \*

英國國教與天主教的衝突對政治與社會的影響在復辟時期與十八世紀尤為顯著。1688 年的光榮革命肇因於詹姆士二世堅持將天主教徒安插到政府各部門。因此國會決定邀請他信奉新教的女兒瑪莉及其荷蘭夫婿威廉入侵英國。為了要排擠非信仰英國國教者（天主教徒及清教徒等），國會也通過審查律（the Test Act），要求擔任政府文武百官必須宣誓信奉英國國教。在此時期，英國國教的力量支配整個國家與社會。自然地，文學的創作也與此潮流息息相關。

班楊（John Bunyan）的《天路歷程》（*The Pilgrim's Progress*）在當時是家家戶戶除了聖經以外必備的一本書。基本上它是依循中世紀時期的道德劇（the morality play）以擬人化的寓言方式來描述



人生歷程。如同十五世紀的道德劇《凡夫俗子》(*Everyman*)中的主角一樣，此書探討每個人在死亡之前，要如何檢視他的一生。財富、親友、美貌、力量、感官到了人生的最終一刻都無法提供任何奧援。唯有個人的善行能伴隨每個人前往另一個世界。而班楊的寓言故事中，主角基督徒(Christian)發現他所處的城市已經墮落時，他希望他的妻小能陪同他出發尋求救贖。然而他們卻不願離開，基督徒只好隻身啓程。在絕望深淵(the Slough of Despair)中，基督徒藉由上帝的使者(Help)之協助而能重拾信念。在羞辱之谷(the Valley of Humiliation)中，他必須戰勝一隻魔鬼般的噴火怪獸(Apollyon)才得以脫身。而經過浮華市集(Vanity Fair)時，由於基督徒與他的同伴信念(Faithful)不願購買市集中所兜售的各種商品，以及不願同流合污接受市集的虛浮理念，不久後即被逮捕。他的夥伴信念也因此被判處火刑，像殉教者一樣活活被燒死。最後在希望(Hopeful)的陪伴下，經歷旅途中各種肉體與精神的艱難與誘惑後，基督徒最終抵達天國樂土(Celestial City)。在班楊的作品中，他成功地塑造出一個基督戰士(Christian Warrior)的角色。不像《凡夫俗子》中的主角在面對最後審判時所持的被動態度，班楊的基督徒變成一個積極進取去尋求個人最後救贖的角色。這種宗教觀也改變了傳統上信徒默默接受上帝恩典的信仰觀念，或是鄧恩較為詭異的手法，從而影響後世對人神關係的看法。

德萊登(John Dryden)是英國歷史上第一位桂冠詩人。他的作品主導整個十七世紀下半葉的英國文壇，並左右十八世紀英國文學的發展。他的作品同時也反映此時期宗教對文學的影響。在《押沙龍與亞希多弗》(*Absalom and Achitophel*)這首長詩中，他藉由聖經上大衛王與押沙龍的故事來攻擊查爾斯二世的庶子蒙茅斯(the Duke of Monmouth)在沙夫茲巴利(the Earl of Shaftesbury)的慫恿與支持下，起兵叛變的事件。德萊登幾乎天衣無縫地將聖經故事套用在

當時的歷史事件之中。詩中敘述大衛王如何地寵愛與包容押沙龍，然而後者卻忘恩負義、大逆不道，起兵試圖謀篡以色列的王位。而亞希多弗又是如何奸巧地利用詭辯與甜言蜜語煽動押沙龍奪取其父王的權位。當時英國一些複雜的政治、宗教、社會衝突，甚至是個人恩怨，在德萊登巧妙地運用聖經故事下，一切簡化成是非善惡、黑白分明的歷史事件。這也是英國文學史上，利用宗教故事來達成文壇鬥爭目的最成功的例子。在另一首詩〈弗雷克諾之子〉（Mac Flecknoe）中，德萊登利用基督教中先知傳承的故事，把接替他成為桂冠詩人的沙德維爾（Thomas Shadwell），以反諷的手法比擬為一個不入流的神父兼作家弗雷克諾的兒子，導致沙德維爾幾乎是「遺臭萬年」。除此之外，在〈俗人的宗教〉（“Religio Laici”）一詩中，他強力捍衛英國國教而攻擊天主教與其他新教教派。然而他在 1685 年詹姆士二世即位後改信天主教後，他反而撰寫《雌鹿與花豹》（*The Hind and the Panther*）來維護天主教教義。在德萊登的作品中，宗教似乎強勢地主導文學的走向。

\* \* \*

十九世紀初期，相對穩定的宗教觀普遍展現在當時的文學之中。衛斯理（John Wesley）所領導的衛理教派（Methodism）強調個人救贖必須植基於與上帝的直接接觸。雖然這種教義對傳統教會帶來不小的衝擊，教會人員仍能怡然地悠遊於鄉紳之間，積極地參與俗世間的各種社交活動。之後，維多利亞時期的牛津運動（the Oxford Movement）試圖復興天主教的教義。生物學（人類的進化）、地質學（地層的累積）、以及天文學（宇宙的概念）所帶來的科學新知，顛覆傳統宗教的創世觀，再加上教會過度的僵化與世俗化，種種衝擊讓不少人產生信仰危機。

奧斯汀（Jane Austen）雖然很少直接探討宗教的議題，然而



其小說中的許多角色都是神職人員，如《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中的負面角色柯林斯（William Collins）。《理性與感性》（*Sense and Sensibility*）、《曼斯菲德莊園》（*Mansfield Park*）、與《北怒僧院》（*Northanger Abbey*）三部小說的男主角都是或即將成為神職人員。神職人員在奧斯汀小說所描繪的中上階層社會中，不但代表社會的道德支柱，也顯示奧斯汀小說中所呈現的嚴謹道德標準。不論是《理性與感性》中的艾德華（Edward Ferrars）、《曼斯菲德莊園》中的艾德蒙（Edmund Bertram）、或是《北怒僧院》中的亨利（Henry Tilney），都具有高尚的人品與高貴的情操。他們不僅是小說的主角，也是為人所景仰的道德模範。《傲慢與偏見》中的柯林斯，雖極為膚淺且善於逢迎，但他卻能逆來順受，在治家、經營教區、主持禮拜的表現中，卻也不失神職人員該具有的風範。奧斯汀拒絕讓見利忘義、見異思遷的威肯（George Wickham）當上神職人員，更透露出在她的小說世界中，神職人員確有其神聖性。不具備相當的道德標準，是不夠資格勝任的。藉由對不同時空中的神職人員之描述以及透過其他的角色對他們的看法，奧斯汀間接地呈現宗教對個人與社會的影響。雖然在小說中，宗教不再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它已蛻變為深植人心的道德標準，繼續扮演穩定社會的角色。神職人員也不再是高不可攀的職業。隨著逐漸強大的中產階級勢力，神職成為士紳子弟的職業選項之一。神職人員的平民化，也透過奧斯汀的小說具體呈現。

布朗黛（Charlotte Brontë）的《簡愛》（*Jane Eyre*）描述一位女性成長的故事。宗教在其成長過程中，以兩種不同的面向呈現，不時地挑戰與阻礙她的自我實現。首先，簡愛成長與受教的教會慈善學校（Lowood）強調壓抑肉體慾望，宗教似乎成為斂財與恫嚇學生的腐敗工具。校長布洛克赫斯特（Brocklehurst）利用宗教來滿足自己的私慾，並藉著宗教的美名來招攬學生。可是學校的經營卻與

宗教的理想背道而馳。他要求學生過著清苦的生活，導致學生無法滿足最基本溫飽的需求，可是他自己與家人卻享受著豐裕優渥的生活。爲了箝制簡愛的固執與任性，他公然在課堂上藉宗教之名將她打爲異教徒，並要求老師與同學遠離孤立她。因此簡愛剛開始時極度不認同好友海倫（Helen Burns）虔誠的信仰以及壓抑自我並對教義奉行不悖的態度。雖然布洛克赫斯特的罪行最後被揭發並受到應得的懲罰，但海倫也因此死於傷寒。在簡愛成長的前期，企圖收服她的宗教似乎敵不過她對自我的堅持。小說後半段中，宗教則企圖以較親和的面向將她納入。虔誠的聖約翰（St. John Rivers）與他的姐妹們在簡愛最困頓的時候協助她，提供她安定的生活，並讓她體驗到幾近完美的宗教家庭生活。聖約翰甚至向她求婚，想帶她一起去印度傳教。雖然她一度動心，但最後仍敵不過內心深處情感的召喚而拒絕。無論是藉由打壓來逼她就範，或是透過溫情來打動她，宗教在簡愛的成長過程中似乎只是扮演提供試煉的角色。布朗黛這本小說凸顯，在宗教各種外在形式的壓抑下，簡愛如何掙脫束縛以達成對自我的肯定與捍衛。

特洛普（Anthony Trollope）的《巴賽特郡編年紀》（*The Barsetshire Chronicles*）由六本小說合組而成。這套小說忠實地呈現英國國教在維多利亞時期的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藉由教會、鄉紳、與改革人士之間種種權力與利益的糾葛，特洛普巧妙地勾勒一些教會人員的自私、貪婪、狹視、以及爭權奪利的醜陋面。在《監察者》（*The Warden*）一書中，過著恬淡生活的牧師哈定（Septimus Harding）因緣際會地被授予一個閒差，擔任一所由教會經營的慈善機關（Hiram Hospital）之監察管理人。雖然他竭盡所能地讓住在那裡的十二位老人過著閒逸的養老生活，可是這個工作所帶來的豐厚收入，卻無法獲得一些改革人士的認同。最終哈定被迫辭職。雖然博德（John Bold）所帶領的改革者也不願看到如此盡忠職守的好人因此生活陷

入困境。但是他們針對的是體制的改革，而非個人的恩怨。在利益與信念衝突之中，改革的高尚理想勢必超越個人的情誼。《巴徹斯特塔》（*Barchester Towers*）這本小說雖然強調個人意志與社會期待之間的衝突，然而整本小說中的主要角色，幾乎都與教會有著密切的關係。個人的抉擇與教派的利益環環相扣。富孀艾莉娜（Eleanor Bold）必須在三個追求者中做出抉擇。這三個追求者都是教會人士，分別代表不同的教會背景與教會利益（如福音教派與高教會派）。不同於以往小說的女主角之婚姻抉擇多半為個人理念的體現，在教會的利益糾葛中，艾莉娜的個人情感已不是決定性的因素。而宗教在特洛普的小說中，也因過度世俗化而逐漸失去其淑世的功能。

宗教在哈地（Thomas Hardy）的小說《黛絲》（*Tess of the d'Urbervilles*）中，也是以較負面的方式呈現。命運多舛的黛絲多次企圖透過宗教來獲得心靈的慰藉，但宗教的僵化與冷酷導致她的人生最終以悲劇收場。首先是黛絲自己教區的神職人員，墨守宗教形式，認定黛絲違反宗教戒律，因而不肯為她的私生子施洗禮，之後也拒絕讓這個早夭的小孩在教會墓園中埋葬。對宗教感到失望的黛絲，決定自己為他施行洗禮，並親手將他葬於墓園的角落。她的丈夫名為安琪（天使）（Angel Clare），顧名思義是上帝的使者，理應擔負起守護她的任務。但他非但無法接受黛絲的過去，更墨守僵化的傳統教義，認定奪其童貞的艾利克（Alec d'Urberville）才是她真正的丈夫。安琪不但陷她於孤苦無依的境地，更埋下她最後殺害艾利克的伏筆。誘惑她失貞的艾利克看似一時棄惡從善，變成激進的宗教演說家。但他與黛絲重逢後，卻運用花言巧語，說服黛絲不要相信安琪會原諒她。在天使與惡魔的交戰中，懦弱的安琪未能提供即時的援助。陷入絕境的黛絲，為了安頓流離失所的家人，只能再度成為艾利克的情婦，而落入強勢的惡魔手中。黛絲走投無路時，曾一度步行至安琪的牧師父親教區，試圖詢問他的下落。但她在牧

師住宅窗外聽到安琪同為牧師的哥哥與雙親談到他們不幸的婚姻後，黛絲深覺受傷，黯然離開。在哈地的許多小說中，宗教已全然失去救贖的力量。在主角最徬徨無助時，它不但無法提供任何支持或希望，有時甚至落井下石，加重其困境。艾利克對宗教的突然狂熱與迅速冷卻，也是哈地對宗教的本質退化、喪失淑世功能的一種批判。

\* \* \*

二十世紀上半葉兩次世界大戰無情的洗禮，一再地讓人們對上帝的存在與恩典產生懷疑。雖然有作家奉行堅忍主義（stoicism），強調在面對困境時，人們必須咬緊牙關，堅毅地接受命運所有的安排。然而有更多的作家（尤其是所謂的戰爭詩人）對歐洲文明與宗教失望，他們的作品中瀰漫著悲觀主義。有些作家試圖藉由完全否定上帝的存在，屢經信仰的掙扎後，最終重新肯定並獲得上帝的恩典。有些作家則試圖透過基督教以外的宗教理念，來彰顯西方信仰的虛浮與危機。

福斯特（E. M. Forster）的《印度之旅》（*A Passage to India*）將英國文學中的宗教議題進一步擴大至西方文化與東方文明之間的衝突。宗教不但凸顯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對立，同時也增強被殖民者的民族認同與國家意識。但福斯特認為，狹隘的宗教理念只會加深衝突，無法解決存在於當時印度內部的根本問題。穆斯林阿濟斯（Aziz）與基督徒摩爾太太（Mrs. Moore）在各自族群中皆屬於較富同情心與較具包容性的人，也最有可能建立跨越族群的友誼。然而阿濟斯對英國女士來訪者一連串善意的舉動，卻為他帶來難以承受的結果，進而挑起種族間存在已久的仇視。而一向友善的摩爾太太，卻在石穴之旅後，頓悟到人世間的一切努力終將歸零，變成一個虛無主義者，無法及時對阿濟斯伸出援手，因而阻斷種族和解的

契機。福斯特似乎暗示，唯一有可能為印度帶來救贖的是印度教的代表人物戈柏里（Godbole）。他認為人類應超越世俗紛爭，而專心致力於精神層面的提升。對於阿濟斯被指控一事，戈柏里也認為每一個人都受到牽連，而不應偏袒任何一方。他在招待英國女士們的茶會上，唱了一首有關擠牛乳女工祈求神降臨的印度歌，其中的迭句「Come! Come!」多次出現在小說中，象徵整個印度等待上天解救的殷切企盼。在小說結尾，阿濟斯自我放逐到印度教的地區行醫。他與費爾丁（Cecil Fielding）的誤會雖然冰釋，但是因為政治立場的歧異，也無法再度成為摯友。印度教的祭典雖然呈現出一種宗教和諧，然而神終究沒有現身。世俗間的一切，都像石穴中的回音，最終都變成一些無意義的 boum 的回音。

沃（Evelyn Waugh）的《重返白莊》（*Brideshead Revisited*）試圖藉由小說中的各個角色對天主教及其教義的抗拒，來建立宗教的地位，並凸顯它對生命的深刻影響。白莊一家人因為對宗教信仰的歧異，導致家庭關係分崩離析。而無意間闖進這家族的男主角萊德（Charles Ryder），也意外地歷經一場信仰的試煉。白莊男主人馬奇敏侯爵（Lord Marchmain）先是為了婚姻而放棄英國國教改信天主教。後來他公開拋棄天主教、離開他虔誠的妻子、遠走義大利與情婦同居。得知來日不多後，他重回白莊。在臨死彌留之際，他以微弱的手勢接受神父的聖禮而懺悔其罪行。馬奇敏夫人（Lady Marchmain）靠著嚴守天主教戒律的力量，獨自支撐日漸沒落的家業與養育四名子女，最後抑鬱而終。次子西貝斯群（Sebastian）因思念父親，對信仰感到徬徨。他長期藉酗酒麻痺自己，來逃避家庭與特殊性向所帶給他的痛苦。最後絕望且受病魔纏身的他為一所修道院收容，以另一種形式回到宗教的懷抱。白莊叛逆的長女茱莉亞（Julia）選擇放棄她深愛的男主角而與富有但教養不好的雷克斯（Rex Mottram）結婚。由於雷克斯離過婚，因此無法如願成為天主教徒，與茱

莉亞在天主教堂結婚。此結果讓馬奇敏夫人無法釋懷。茱莉亞與萊德多年後重逢，重燃愛苗而同居，最後一起陪伴馬奇敏侯爵渡過臨終的日子。男主角萊德一向是個無神論者。但他目睹白莊主人臨死前懺悔、再度擁抱宗教的一幕，也不禁為之動容，內心跟著一起禱告。這一幕同時也讓茱莉亞重新體驗，宗教在她生命中的重要性，決定終生皈依天主，不與萊德結合。因為在神的面前，他們的婚姻是有罪的。幾年後，萊德重返白莊，在一個小教堂中，他突然頓悟，不自主地以右手畫十而接受天主。在整部小說中，宗教時時刻刻地左右主要角色的命運。最終所有的迷途羔羊都回到天主的懷抱。

葛林（Graham Greene）的《情斷緣盡》（*The End of the Affair*）常被視為一本天主教小說。小說以愛與恨兩大主題來對照並區分兒女私情與上帝之愛。男主角莫利斯（Maurice Bendrix）與有夫之婦莎拉（Sarah Miles）發生婚外情。佔有欲與忌妒心強的莫利斯認為莎拉隨時會離開他。在一次幽會時，莫利斯住所遭受到德軍轟炸。在莫利斯奇蹟似的醒來後，莎拉離開了他。莫利斯認定莎拉另有情夫，因此充滿恨意的他，雇用私家偵探來調查她的行蹤與偷看她的日記。從莎拉的日記中，他得知她的『情人』其實就是上帝。原來在轟炸當時，莎拉以為莫利斯已死，在絕望中她向她原本不信的上帝禱告，若莫利斯能復活，她將永遠與其分手。她的禱告奇蹟般地即時實現。她遵守誓言離開了莫利斯，也逐漸地重新接受上帝與天主教。得知真相的莫利斯，從此視上帝為情敵，並希望從上帝手中奪回莎拉。不相信上帝存在的莫利斯認為，因為他感受不到上帝，因此上帝是不存在的。唯有莎拉回到他身邊，他才能感受他們的愛存在。但重獲信仰的莎拉卻認為神的愛超越男女之情。她認為相處在一起不是愛的必要條件。很多人從未看過上帝，但他們一生仍然愛著祂。在莎拉病逝之前，她告訴莫利斯這是上帝對她的懲罰：我向命運挑戰，命運也有了回應。她在死前在給莫利斯的信中寫道：



「我相信上帝的存在，我相信這整齣騙局。……我像感染疾病般的感染到信仰。我像墜入愛河般地墜入信仰。」最終，充滿悲憤的莫利斯不停地向上帝抗議：「上帝，我恨你，就如同你存在一樣。」很弔詭的是，因為恨，莫利斯不得不接受上帝的存在。

\* \* \*

如果文學是以美學的方式萃取人類日常生活所累積的經驗，那麼原本神聖不可侵犯的宗教理念透過文學與生活能更緊密結合而深植人心，進而達到教化與淑世的功能。宗教與政治及社會的糾葛讓英國歷史更加地豐富與多元，而宗教在英國社會的重要地位也提供了文學一個絕佳的創作素材。從以上所列舉與簡要討論的作品中可看出，不論是直接或間接，宗教的蹤影在英國文學作品中處處可見。文學因宗教而更豐富，宗教則因文學而更彰顯。文學與宗教已發展出一種共生共榮（融）的密切關係。

## 引用書目

- Austen, Jane. *Emma*. Ed. Stephen M. Parrish. New York: Norton, 1972.
- \_\_\_\_\_. *Mansfield Park*. Ed. Claudia L. Johnson. New York: Norton, 1998.
- \_\_\_\_\_. *Northanger Abbey*. New York: Longman, 2004.
- \_\_\_\_\_. *Sense and Sensibility*.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3.
- Brontë, Charlotte. *Jane Eyre*. Ed. Richard J. Dunn. New York: Norton, 2001.
- Bunyan, John. *The Pilgrim's Progress*. Oxford: Oxford UP, 2009.
- Chaucer, Geoffrey. *The Canterbury Tales. The Riverside Chaucer*. Ed. Larry D. Bens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7.
- Donaldson, E. Talbot, trans. *Beowulf*. Ed. Joseph F. Tusso. New York: Norton, 1975.
- Donne, John. *The Complete Poem of John Donne*. London: J.M. Dent & Sons, 1985.
- Dryden, John. *The Major Works*. Oxford: Oxford UP, 2003.
- Forster, E. M. *A Passage to India*. New York: Harvest/HBJ, 1984.
- Gardner, John, 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the Gawain Poet*.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65.
- Greene, Graham. *The End of the Affair*. New York: Vintage, 2001.
- Hardy, Thomas.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Ed. Scott Elledge. New York: Norton, 1991.
- Milton, John. *Paradise Lost*. Ed. Scott Elledge. New York: Norton, 1992.
- Shakespeare, William. *The Merchant of Venice*. Ed. Leah S. Marcus. New York: Norton, 2005.
- Trollope, Anthony. *Barchester Tow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2.
- \_\_\_\_\_. *The Warden*. Oxford: Oxford UP, 1998.
- Waugh, Evelyn. *Brideshead Revisited*. New York: Everyman's Library, 1993.